



当我轻轻翻开这本《抗战家书》，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烽火岁月的时光之门，那些被历史尘封的记忆，带着滚烫的温度，扑面而来。翻阅之际，恍惚可见字里行间浮动千万英魂，他们以墨迹为唇舌，向我们这些后人低语着那个充满铁与血、恨与爱的年代。

书中收录了左权、张自忠、赵一曼等40余位抗战先辈的近百封家书，时间跨度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，涵盖了14年抗战的全过程。这些家书，既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里英雄的壮语，也有正面战场官兵的悲歌，更有爱国华侨、普通民众的心声。

家书，原是世间至为私密温柔之物，往往承载着柴米油盐的牵挂与春花秋月的闲愁。然而抗战家书却凝聚了历史狰狞的一面——最私人的情感被最公共的灾难劫持，最柔软的絮语必须叙述最残酷的现实。纸短情长的，大抵如是。褪色的信笺上，父亲不再是抽象的民族英雄，只是一个为女儿买不到花布而愧疚的男人；儿子是慷慨赴死的战士，也是母亲梦中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。人性在此被压缩于方寸纸页，却迸发出惊人的精神密度。家书作者们以朴素甚或笨拙的笔触，将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溶解于具体而细微的个体经验中，于是，抗战历史不再是一场战役和伤亡人员的数字罗列，而成为千万个家庭饭桌上缺席的那个座位，望穿秋水却不见归人的那份绝望。历史在此获得了体温与心跳。

赵一曼就义前留给幼子宁儿的泣血遗言：“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……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字里行间，一位母亲的决绝与深爱，以及一个民族永不低头的脊梁显露无遗。还有张自忠将军在殉国前，向战友们发出的最后呐喊：“国家到了如此地步，除我等为其死，毫无其他办法……愿与诸弟共勉之。”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“尽忠报国”的沉重分量。

除了英雄人物的家书，书中还收集许多来自普通民众的信件，他们的故事同样感人。如上海的一位小学教员姚稚鲁，在上海沦陷后到后方逃难，期间给家人写了十几封信，他本想找到落脚之处后再接妻女团聚，最终却没能等到这一天。这些普通民众的家书，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对无数家庭的残酷摧残，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抗战的伟大意义。

《抗战家书》（增订版）新增的近百封珍贵家书，为我们展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抗战故事。每封家书背后，都有一段真实感人的经历，当我们知道这封信是写于战火纷飞的间隙，或是走向刑场的前夜，或是自知生还无望的诀别时，那些朴素的文字，便拥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。

在阅读这些家书的过程中，我时常被先辈们的家国情怀感动。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，舍小家为大家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只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荣誉。他们对家人的思念、对亲人的牵挂，都化作了抗日的坚定力量。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、不屈的民族气节、向死而生的勇气，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走向复兴的密码。合上书页，那些呐喊与低语提醒着我们：今日中国的平静生活，皆由昔日非凡的牺牲所换来。这份记忆，沉重如铅，亦珍贵如金，它应当成为我们不断自我审视的镜鉴。

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，但这些家书所承载的精神，永远不会过时，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当我们享受着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时，更应该铭记那段山河破碎的苦难历史，铭记那些为了反击侵略者而付出生命的先辈们。硝烟终将散尽，玫瑰依然绽放。现世安好，文字不死，记忆长青——这或许是对抗战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战火中的人间百态

■ 甘武进

“战事逐渐扩大，住在战区的老百姓，纷纷向租界上逃来，不仅是上海四郊的人，连苏州、无锡、镇江的人也都避难上海……”以往，战争往往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被铭记，那些金戈铁马、硝烟弥漫的战役，以及扭转乾坤的重大决策，构成我们对抗战历史的基本认知。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开启了一扇别样的窗，让人得以窥见抗战时期上海这座城市的微观世界，领略到那段岁月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韧，以及社会万象的斑驳陆离。

此书是一部极具价值的记录抗战时期上海社会百态的书籍。作者陈存仁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上海的一个中医，凭借医师身份与上海滩的三教九流广泛交往，这为他记录抗战时期的生活提供了独特视角。全书收录近百幅珍贵老照片，将我们带回1937—1945年的上海街头：战事爆发后仓皇奔逃的难民、曾经繁华的闹市突落炸弹……这些鲜活的细节让抗战历史不再遥远，仿佛我们正与作者一同挤在租界的屋檐下，感受战火中的人间冷暖。

在书中，作者以亲身经历为素材，细腻地描绘了上海沦陷后百姓的生活画卷。淞沪会战爆发后，曾经的十里洋场，瞬间陷入战火纷飞之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惨象环生。“整排马路有六排尸体，这些尸体都是较为完整的，其他支离残缺的，如无头的尸体，以及有头无躯的和断手断臂，就由普善山庄的车辆，运到沪西郊区‘万人冢’埋掉。”作者以纪实的手法，记录下了大世界游乐场门前十字路口日军飞机投弹，致使一千多人被炸死、伤者不计其数的人间惨剧。而这，仅仅是抗战苦难的冰山一角。

战火让100多万人沦为了难民，他们如潮水般涌入租界，挤在街头，食不果腹。仁济育婴堂半天就收容了200多名弃婴，婴儿没奶吃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。陈存仁凭借自己的智慧，暂时缓解危机。一对有身份的夫妇，原本对他的做法有所质疑，在看到问题迅速解决后，当即捐出1万元支票的善款，还想收养4个婴儿。多年后，他和那对夫妇在香港相遇，身旁的男孩一副大学生模样，以及夫妇口中在美国的另外3个孩子，其中两个博士、一个在读硕士，虽未言明，但彼此心照不宣，这背后隐藏着多少故事，又饱含着多少在乱世中难得的温情与希望。

上海沦为“孤岛”后，道德伦理的底线不断被冲击。一部分人在绝望中选择堕落，为了生计不惜出卖尊严。而汉奸们的丑态，更是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汉奸头子孙嘉福，在路过日本人关卡时，即便身为维持会会长，也免不了被掌掴，卑躬屈膝的模样令人不齿。但他并未因儿子之死而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地作恶。

书中也不乏展现人性光辉的瞬间。面对日军的残暴统治，仍有许多人坚守正义，勇敢地抗争。作者诊所雇用的“挂号先生”小汪，暗中收集房客谭某的信件，这些都是能证实谭某是日本间谍的证据，还亲自具名控告。最终，谭某父子和8个日本特务被依法处决。陈存仁告诫小汪这样做太大胆时，小汪说：“抗战是必胜的，我的父母和哥哥都是在日军入驻江阴时被他们刺死的……此仇我非报不可。”小汪的事迹在当时的报纸上登得简略，但被作者详细地记录下来，让我们看到在黑暗中，仍有这样闪耀着光芒的人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，为民族的尊严而抗争。

历史的温度，藏在普通人的泪与笑之中。此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。这些民间记忆填补了史书的缝隙，让抗战历史变得更加丰满、立体，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实状态，无论是苦难、挣扎，还是希望、坚守，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。读完此书，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，也更加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

历史的底片在暗房闪光

■ 钱俊男

暑期上映并获得好评的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片，它没有宏大的战场调度，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彰显的冲锋陷阵，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间在1937年南京沦陷后奇迹般存活的照相馆。在这里，胶片与枪声交错，显影液与血泪交融，历史的真相在暗房的红光中逐渐浮现。

在大多数战争片中，战场是硝烟弥漫的前线，而《南京照相馆》却将“战场”设定在一间狭小的照相馆内。这里没有枪炮，却比任何战场都更残酷——因为它的武器是“影像”。日军军官带着记录暴行的胶卷前来冲洗，试图用“亲善照”掩盖罪行，而中国平民则在暗房里偷偷复制罪证。照相馆成了两种记忆的角力场：一方试图篡改，一方誓死保存。导演巧妙地利用空间叙事，使照相馆成为南京城的缩影。地下室藏匿着逃难者，暗房则成为真相的显示器。当刘昊然饰演的阿昌在红光下颤抖着冲洗日军暴行的照片时，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画面上的血迹，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的挣扎。这种微视角让历史的沉重感更加具体，也让“记忆”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的设定揭示了影像的双重暴力——它既能记录真相，也能被权力扭曲。日军用相机拍摄虚假的“亲善照”，试图用影像构建一个“和平占领”的谎言；而中国人则用同样的相机，将暴行定格为铁证。影片中，快门声与枪声同步剪辑，暗示了影像本身就是武器。这种对比在角色塑造上尤为鲜明。王传君饰演的翻译官王广海，起初为了生存协助日军，却在目睹婴儿被摔死后陷入精神崩溃。他的转变揭示了“合作者”内心的撕裂——当影像成为谎言工具，人的良知该如何自处？而高叶饰演的林毓秀，则将罪证底片缝进旗袍，让个人苦难升华为民族记忆的载体。影像在这里不仅是记录，更是抵抗的象征。

对“幸存者”的刻画是《南京照相馆》令人震撼的一幕。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悲情，而是用克制的镜头展现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。阿昌从最初的怯懦到最后的牺牲，照相馆老板老金在绝境中仍坚守技术尊严，甚至翻译官王广海的矛盾与悔恨，都让角色塑造超越了善恶二分的简单模式。影片的结尾，1937年的战争废墟与2025年的南京街景叠化，暗示记忆的延续。那些被保存的底片，最终成为历史的见证。这种处理避免了廉价地煽情，而是让观众在沉默中感受历史的重量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没有将历史简化为口号或符号，而是通过影像的力量，让观众成为真相的“显影者”。在当今信息过载的时代，历史的真相仍可能被篡改或遗忘，而这部电影就像暗房里的那束红光，照见了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的伤痕，又如何在当下坚守良知；当历史的底片递到手中，我们是选择显影，还是任由它褪色？答案，或许就藏在每个观众的沉默与泪水中。



活成“自己喜欢的模样”

■ 留丽灵

蛤蟆精笨拙地披上袈裟，小猪妖扛起钉耙，黄鼠狼精努力憋着不说话，猩猩怪半天说不全“我是齐天大圣”6个字……影厅里的笑声几乎要掀翻屋顶。

暑假，我与女儿一同观看了《浪浪山的小妖怪》，影片中4个底层小妖怪，为了搏个前程，竟胆大包天地冒充唐僧师徒踏上“西天取经”之路。它们漏洞百出、笑料不断的“cosplay”和荒诞冒险，确实瞬间俘获了全场的童心，大人、小孩均笑得前仰后合。然而，就在这片纯粹的欢乐之下，人们的笑意里慢慢多了一份复杂的滋味，那是对剧中那句灵魂宣言——“因为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”的深深共鸣。

这是一场充满解构与反讽的“冒名者狂欢”。影片精心塑造了4个与原著经典形象形成绝妙倒置的小妖怪：蛤蟆精心猿意马、时常动摇，披着袈裟，念着歪经，对前路充满迷茫，却冒名原著里意志如磐石的圣僧，在此成了“领导者”；小猪妖聪明伶俐、鬼点子频出，颠覆了原著八戒懒惰贪吃的刻板印象，变身“智多星”，成了“取经”的顶梁柱；猩猩怪一个深度“宅男社恐”，面对挑战，他的第一反应是退缩，没有齐天大圣的灵动威武，却在关键时刻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；黄鼠狼精是个一刻也停不下嘴的“话痨”，他努力想扮演好沉默寡言的苦行僧形象，却总控制不住表达的欲望，憨态可掬。

这种颠覆并非只为博君一笑。它如同一面哈哈镜，既映照出经典角色的某些特质在极端环境下的变形，更犀利地指向了标签化认知的荒谬。观众在笑声中恍然：原来“八戒”可以很机智，“悟空”也会很“社恐”，“沙僧”也能是“话痨”——固有的标签，从来框不住鲜活的个体。

在我看来，影片的深刻远不止于解构的幽默。当4个小妖怪为了“混口饭吃”铤而走险，却在旅途中逐渐觉醒，最终为了拯救无辜孩童，明知对手是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妖魔，依然选择挺身而出，亮出“大招”奋力一搏时——“因为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”这句心声，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这“喜欢的模样”，不是成为光芒万丈的“唐僧师徒”，而是找回并坚守他们自己内心认同的“真我”。小猪妖的聪明不再只为偷奸耍滑，而是为了守护心中正义；猩猩怪的“社恐”在保护弱小的勇气中不复存在；黄鼠狼精的“话痨”化作了鼓舞同伴的号角；就连心志不坚的蛤蟆精，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挺身而出。他们的“西行”，从一场荒诞的骗局转变为一场寻找自我价值、践行内心道义的觉醒之旅。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壮举，并非出于成为英雄野心，而是源于对“成为怎样的自己”这一答案的确认与捍卫。

有影评人评此片曰“用最荒诞的糖衣，包裹着最严肃的成长命题”“巧妙地将经典IP作为背景板，让4个‘冒名者’在解构权威形象的过程中，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艰难重构”，说得非常在理。

散场时，女儿模仿着小妖们滑稽的招式，笑声依旧清脆。而我心中回荡的却是那4个小妖怪笨拙却无比坚定的身影。他们或许永远成不了威风凛凛的“佛”，但在奋不顾身的一跃中，在喊出“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”那一刻，他们已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四射的“取经”之路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浪浪山”要翻越，这光芒提醒着我们：生命的价值，不在于扮演谁，而在于能否活出那个让自己由衷赞赏的“我”。

我想，在浪浪山的青山绿水里，4个“冒牌货”已然用他们的觉醒与勇气，为所有在尘世中寻找自我坐标的灵魂，点亮了一盏明亮的灯。

纸页间的硝烟与挂念

■ 吴建

【观影】

